

## ■新作聚焦

## 王宏甲长篇报告文学《走向乡村振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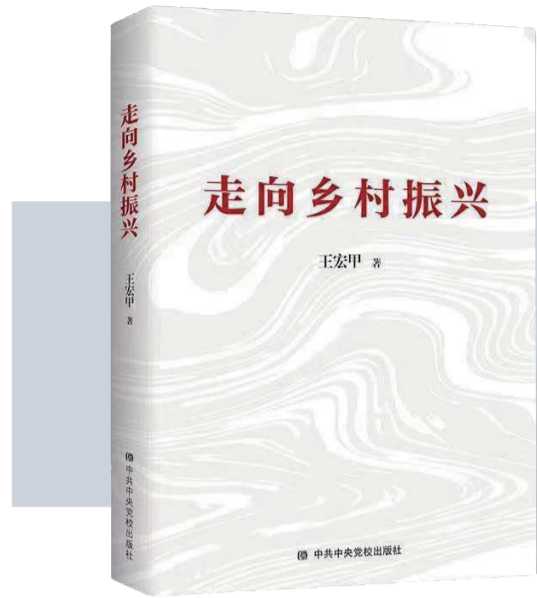
## 溪流归大海

□李炳银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中国打赢了脱贫攻坚之战,创造了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人类奇迹,也创造了当今世界反贫困的伟大辉煌业绩,彰显了奇绝的力量。但是,对于中国这个长久以来一直以农业立国的国家来说,农村建设和发展农村的道路还十分艰巨,依然需要密切关注和精心用力。中央政府新启动展开的乡村振兴行动,就是这个新的战略战役开始的号角。

王宏甲20多年奔走于全国各地,特别是近四年足迹到达全国多省市自治区的300多个自然村寨,持续不断进行深入观察、调研、理解和思考,在这个国家新发展战役刚刚开始的时候,就以报告文学《走向乡村振兴》提出自己的个性发现和思考主张,非常具有启示作用。王宏甲是当今中国最具有思想特点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智慧风暴》《中国新教育风暴》《农民》《塘约道路》《中国天眼:南仁东传》等,都曾经不断地以自己某个地方、事件、领域、人物的个性认识表达,发散出十分个性的思想见识而被人们关注,在社会上产生影响。他的作品个性独特、内容饱满、思想敏锐,是报告文学这种不断介入社会现实生活,在动态的生活矛盾中体现自己存在价值和行动能力的精髓表现,也是最好的呈现作家社会使命责任、态度能力的重要表现方式。

《走向乡村振兴》是作家王宏甲多年在贵州、内蒙古、山东、湖南、山西、新疆、河北等很多地方农村,在许多真实的乡村面貌改变和农民命运改变情形中,发现和理解乡村现实及其变化的作品。在写作中,他不辞劳苦,在辛勤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产生了思考结晶。《走向乡村振兴》中,有很多农村发展变化的表现情形如实再现,有各种人物精彩作为及生活命运改变的情形,在这许多种考察理解和思考之后,作者认为,贵州安顺的塘约村、毕节的天坝村,山东烟台的农家村、槐树庄村,山西汾阳的贾家庄等这样坚持统一领导、集体动作、适度规模、多种经营、合理分配、共同富裕的方向道路,对于现今阶段的中国乡村是比较切实理想的振兴发展方式。贵州安顺的塘约村支书说“单打独斗没出路”,这是他们自身惨痛经历得出的教训,引起很大关注,也已经被许多走集体致富道路的地方所验证。这种集体统筹发展的方式,既可以将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很好地在农村实现,也有利于防止农民分散经营或简单结合带来的经营局限、分配不公而导



《走向乡村振兴》充分显示了王宏甲的文学态度、主张和方向目标,这就是文学的人民性方向和作家抱有强烈的使命追求、责任担当。

致贫富两极分化的弊端,还因为集体生产规模的多样扩大可以给人才提供较大活动平台,使乡村独特文化得到保存、人们的亲情联系更紧密,还因为集体道路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团队意识,发挥组织力量完成较大目标实现等等。这些集体发展、共同富裕的乡村,虽然实现的方式各有区别,但在坚持党的领导、团结同心、攻坚克难、合理分配等方面,都是相近的。《走向乡村振兴》真实生动的讲述,使人们对主张完全彻底私有化、唯个体化的见识发生怀疑,对集体经营、共同富裕的未来产生积极的期待。乡村振兴可以有各种探索途径,进行多样试验,但如果看不到集体经济发展、共同富裕的长远未来前景,会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溪水东流,终归大海。共同富裕是人们的美好希冀,也应该是代表着未来的方向目标!

《走向乡村振兴》显示了王宏甲新的文学创作追求。这部作品同他此前的作品在叙述表达方面有所变化,虽然也真实地描绘到不少地方、人物的感人事迹,但更多是通过实际论证的形象叙述,强调集体经济发展、共同富裕的可能性和理想实现方式,并给以充分的信念坚守和推广。这种个性分明的真实表达,同现

今大量更多依附于事实、只满足作简单客观认证表达的报告文学作品是有很多区别的。作品中对人民群众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胜利的关系,对集体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可能性的观察判断见解,对很多干部存在“爱富嫌贫”意识倾向危害性的发现,对于贫富失衡在人的权利、地位、尊严、精神、情感、行动等方面的各种影响,以及因不公平造成的危险恶果,对“知识”的立场和胸怀态度的分辨警惕眼光等等,都具有深刻独到的犀利特点,令人沉思和震撼。这部作品中,王宏甲将自己思想强悍的创作风格充分表现和发扬,使之成为一种思想精神的旗帜,超越了日常的文学藩属和形态。

《走向乡村振兴》充分显示了王宏甲的文学态度、主张和方向目标,这就是文学的人民性方向和作家抱有强烈的使命追求、责任担当,以及积极深入并智慧地参与现实社会健康发展变革的行动作为,“经世致用”的努力。王宏甲的作品是具有超越表层现象的庄严探究,是一种君子之思。高尚纯净、独特有力、深入浅出,大道至简,这是一种大格局下的大胸怀、大思考,给人磅礴厚重的气象。

## ■关注

村庄是一个极富感染力的意象。在许多人心目中,村庄的含义已经凝聚为“故乡”或者乡愁、根基、怀旧、诗意栖居等隐喻性词汇。古人云:故土难离。人生一世何梦萦,思念家乡故土情。无论人们走出多远,故乡始终被视为一个人文化根系的沃土、一个“潜在的精神轴心”。然而,南帆对乡村的独特理解与思考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故乡”层面,力图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乡村的意义。他的散文集《村庄笔记》对于剧变时代中的村庄进行深度观察,敏锐地捕捉当今乡村世界人与土地的鲜活故事,呈现了熟悉而又独特的乡村经验。这是南帆以学者和散文家的双重身份与视角为我们提供的一份独特的当代中国乡村观察。

广袤的“乡土中国”造就了乡土文学的独特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与乡村发生了紧密的关联,乡村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特殊情结”。正如南帆所言,乡村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套生活经验、一个美学对象。各个历史时期,众多作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注到广袤的乡村,汲取精神养料。知识分子投身进入乡村,与土地、农民产生交集,形成了他们对乡村的切身理解与书写。南帆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描述的乡村空间远远超过了数千年古典文学的总和:粮食生产基地的乡村,战火燃烧的乡村、负责精神生产的乡村、城乡对立的乡村、作为民族文明根系的乡村,还有一些面目模糊甚至意义矛盾的乡村。乡村正是在一代代作家的思索与叙写中极大地丰富起来。不言而喻,这些乡村的发展脉络对南帆的乡村观察与理解产生了触动与影响。将《村庄笔记》置于这一历史脉络中加以理解尤为必要。

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散文家,南帆始终对乡村怀有一份独特的情感,这显然与南帆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关联。南帆成长并常年居住于城市,但是,三年的知青生活使他与乡村发生了密切接触。尽管这段经历并不算长,但是,乡村从此作为一个坚硬的印象存留于他的视野中。正如南帆所言:“我的知识库存之中,乡村经验构成了一个深刻而巨大的烙印,潜在地影响为人处世。”先前的散文集《历史盲肠》或许可以视为这一烙印的一份记录。对他来说,知青时期短暂的乡村经历并不仅仅是一段特殊时期的个人回忆,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乡土的审美感知与自觉意识。长期以来,乡村始终盘踞于南帆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的视野之中,获得持续的形象重塑与理论推进。如果说,《历史盲肠》是南帆以个人的文化视角展现自身知青生活和乡村记忆的话,那么,《村庄笔记》则意味着进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对乡村进行更深刻的整体性思考。

“笔记”这一文体形式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就表明了南帆直面村庄现场与时代问题的意图。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南帆既是这个时代的亲历者,也是见证者、勘探者。南帆所叙写的这些村庄并非书斋中臆造的田园诗,而是留下他实地考察或者切身生活的印迹。南帆多次提到走访乡村时的一个痛苦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村庄一天比一天安静,到处都空了。时至今日,“乡土中国”的形象正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变化。快速的现代化与城市化扩张不仅改变了当今村庄的面貌,也改变了乡村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想象。当现代性携带着科技、商业、消费以及现代文化滚滚而来的时候,林立的高楼、纵横的高速公路、琳琅满目的超大商业体、发达的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组成的新型文化视野,剧烈动摇了人们对传统村庄的想象与认知。

《村庄笔记》并不是延续古诗词的山光水色,亦非白描朴素的劳动场所。《村庄笔记》叙写了15个村庄:月洲村、五夫里、林浦村、赵家堡、閩安村、琴江村、螺洲、古山洲,等等。事实上,这些村庄包含了三种形态:一类是如林浦村、螺洲、关口村等靠近城市周边的村庄,它们在工业与现代经济的强大吸附力下已经开始格式化;第二类是如寿山村等深藏于起伏的山脉皱褶之间,远离城市中心的辐射;第三类是如月洲村、五夫里、赵家堡、琴江村等保留着丰富文化遗产,但与现代生活存在相当的距离甚至形成断裂。这三类形态各异的村庄,在一定意义上浓缩了当代中国村庄的真实状况与复杂形态。对于南帆而言,更重要的是这三类村庄形象形成或者组织了各种重要的话题:传统与现代,个人与家、都市文明与乡土文明、全球化与民族性、现实与审美、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等等。

在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大格局中,村庄所占据的位置再度产生了剧烈偏移。村庄里的现代建筑越来越多,田园仿佛消失了。“工业社会的钢铁与集成电路愈来愈密集地嵌入村庄,不动声色地重构传统的农业王国”。田园荒芜,现代社会的工业文明正以各种方式收编并格式化乡村,尤其是那些靠近城市的村庄。閩安村不断进行各种现代式改造,路边盖起一座座现代钢架结构的厂房。关口村已经荡然无存,村庄里的民居拔地而去,夷平的小山头变成了一片新兴的工业园区。更有甚者,“工业社会正在接管公鸡和母鸡”。传统的乡村正在解体,村庄不再有泥土的气息和稻香的芬芳,乡土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时代困境。

对于那些深藏于山脉皱褶之间无数稀稀落落的村庄而言,工业化与城市化何其遥远?由于寿山石矿藏,寿山村形成了特殊的突围路径。然而,更多的村庄无非是农民居家过日子的地方,“大部分村庄既没有戏剧性故事,也没有迷人的风景。”世代在此生活的农民们把“日常生活的全部重量搁到了这一块土地上”。但是,随着年轻一代纷纷提起行囊移居城市,许多村庄已人去楼空,寂静荒芜“如同一具僵硬而空洞的躯壳”。如此迅猛的迁徙显然给这一类村庄带来了巨大的伤害。

相对而言,南帆对第三类村庄倾注了更多的笔墨。在他看来,尽管许多村庄拥有可圈可点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但是它们却与现今的生活脱钩了。“那些朝廷重臣或者状元、榜眼、探花岂能充当天闲聊之际的谈资”,“一些老宅子还悬挂着‘耕读传家’之意的对联”,可是“耕”与“读”之间的循环关系已经中断。古老的状元府如同“一个风烛残年的躯壳已经没有了灵魂”,淘米择菜的日常生活与状元的舞文弄墨怎么衔接不上。村庄中散落着的各式文化遗迹:古老的宗祠与牌坊、书院的废墟、日渐风化的摩崖石刻、名人故居与墓基、盘龙石雕等,已经成为孤零零的器物,没有了生命的迹象。在《村庄笔记》中,南帆敏锐地洞察并捕捉了这些独特而复杂的当代乡村景观,并以双重视域和文学的方式记录下这一系列整体印象与复杂感受。

通过对乡村生活中各种表象和纹理的剖析,南帆在《村庄笔记》中试图深入其中探明更深层的问题。尽管全球化与现代化正在快速推进,但是,南帆敏锐地发现村庄依然葆有难以被格式化的地方与东西。乡村的广袤地域依然存在,南帆清楚地意识到:“农民仍然是社会成员之中最大的一个群落,乡村保存的古老文化仍然隐含着许多富有潜力的命运。”在《村庄笔记》中,他以大量笔墨打撈着这些村庄历史文化的光彩片段,狗吠风流人物事的峥嵘往事。村庄隐藏着丰富的历史传统、文化传承、精神风貌,人格性情以及美学情趣等等,这是一个蕴含着巨大能量的文化空间。通过对张元幹、张圣君、朱熹、柳永、郑成功、陈宝琛等众多历史人物及文化传统的重新叙述,南帆意在阐明:乡土文化仍然葆有潜力,在新的历史坐标中依然具有焕发活力的可能。这既是南帆在《村庄笔记》中贯穿始终的强烈问题意识,也是文学重大的现实关切。

## 重新审视乡村的意义

——评南帆《村庄笔记》

□孔苏颜 颜桂堤



## ■第一感受

## 谍战叙事的光韵

——海飞长篇小说《醒来》读后 □夏烈

再次阅读《醒来》的那天,傍晚的杭州恰巧飞雪。这与小说开头的安排叠合出模糊的相近的气息。“1941年12月24日,23:05,春光照相馆门口。那天,陈开来踏着积雪,去河坊街……”我从书房的单人沙发起身,注目黑魃魃的户外及楼底那橙黄路灯中飘舞的絮影,一边自动地想着小说中的情景,一边则同自己说,电影开演了。

这部不足14万字的小长篇,特别适合做一部抗日谍战题材的电影。小说的篇幅以及这篇幅所构成的主干情节,做电影富富有余,而铺衍成30集以上的电视剧大约显得不够絮叨、不够充实;还有一个原因,似乎是小说的结尾,1951年3月台湾派遭来潜伏的银宝到陈开来照相馆二楼的暗房,她看着墙上挂着的同一个女人的79张照片说:这双脚很美。为什么不拍了?陈开来答:“拍不了,因为那是另一场人生。”瞬间让我感受到电影般的感伤和意境,不由回忆起小说中这79张照片的主人中共地下党员苏门的一幕幕惊人故事,并继续想象她此生再也无法见到战友、见到祖国统一而潜伏于台湾的花一般的“纷纷开且落”。“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不相识的。我们醒了,却不知道我们原来是相亲爱的。”这句在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泰戈尔《飞鸟集》里的诗,此刻仿佛自动成为音乐,在电影的情感柔软处反复奏鸣,清冽而热烈。

《醒来》的书名至少拥有三种意涵。一是小说的角色身份和情节发展都来自一支1941年12月到1942年12月活跃于上海抗日谍战一线的“西湖三景小组”和他们的上级“戴安娜”的故事。他们因为日军的“沉睡计划”必须“醒来”,奔赴到使命和牺牲的前沿阵地。所有的人物都在围绕着“醒来”的过程以及被唤醒后的紧迫工作运转始终。第二种就是《飞鸟集》里所说的“我们醒了,却不知道我们原来是相亲爱的”,在特殊年代和特殊岗位上,制度的安排让不相识的你我因为职责任务而合作信赖,同样的目的、氛围,同样的生死一肉,还有同样的信仰,使得“醒来”的同志们有血肉的联系、有兄弟的友谊、有爱人的深情。第三种“醒来”,我想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理想主义情怀,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人命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感召,正如书中陈开来所说,“我也只讲结果,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信仰一定会赢”,胜利是“醒来”然后以生命与不懈的建设换来的,和平也是。

海飞近10年来将主要精力转向了革命历史题材写作,这在先锋文学和“70后”作家里可

谓别是一家,风格鲜明。《向延安》《旗袍》《回家》《麻雀》《惊蛰》《捕风者》《棋手》《唐山海》等,在构成海飞深入革命历史与革命文化的同时,酝酿着他跨界成为影视编剧,不断从影视艺术和技术中吸收养料,特质移入小说,又将小说叙事搬运至影视的“左右互搏之术”中,小说家海飞和编剧海飞典型地体现着现代小说传统到新故事“说书人”复兴的过渡期特征,及其合二为一的优势。“海飞谍战世界系列”有其世界观构架及互文性,在《醒来》中,你照样能看到那些谍战影视爆款中的熟悉名字一闪又一闪,比如汪伪的特别行动处处长毕忠良和他的太太刘兰芝,比如潜伏在行动处的一队队长中共的陈深和二队长国民党的唐山海,更何况汪伪76号的头目李默群、锄奸队长陶大春这样的在“海飞谍战世界”里无处不在的人物、势力。如此这般,海飞的革命历史尤其是谍战叙事里,来自当代文化工业介入文学创作后的元素、方法、手段,被他有机融合、选择性吸收,实现和实践着海飞样本的创造性和创新性,也使他的作品从小说这一端来看,呈现出杂糅和斑斓的光韵。

这样的光韵拿《醒来》作例,一是呈现出传奇性、戏剧性的风格。历史和英雄落到民间、根植到民间,文明的经验就是逐渐地表现为人物、故事的不同程度的传奇化和戏剧化。作为并不太遥远,且要摆正历史观暨严肃性的革命历史叙事,文学、影视、戏剧数十年来都在作出积极的多样的探索,形成了良好的经验和传统。海飞的革命历史和英雄叙事无疑是在阅读与研究了大量前代人、同代人作品的基础上改良的配方,其中始终有效、有意义的如何对受众讲好这部分“中国故事”,成为有关题材的代表性的“讲故事的人”。《醒来》里的人物故事固然有其历史真实材料依凭,然而究竟充满了紧张悬疑的情节快感和传奇化、戏剧化所常见的巧合、冲突、对手戏。这样一来,《醒来》是好看的,大众的,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醒来》的另一重光韵来自句子的诗意。一部《飞鸟集》从头至尾贯穿着,不仅是文艺范的点缀,而是剧中人物思想情感意志的抒发、写照,那些吟咏着泰戈尔句子的小说人物透露出时代青年、时代英雄的文武之道,或者说是苏门、沈克希、赵前们投笔从戎的来历、修养。“你微微地笑着,不同我说什么话。而我觉得,为了这个,我已等待很久了”“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中由人物来传递,使《飞鸟集》



成为小说《醒来》的一条线索,有关英雄和烈士的心的线索、魂的线索、诗的线索。海飞来擅于处理他小说与影视剧本的区别,也就是在小说里更加注意语言的质地,刻意保留小说家的自我。他喜欢将这种诗意的句子直接用到残酷的物象上去,不落废招。

《醒来》的第三层光韵来源于影像。行动、对话以及纷纷的镜头和镜头的蒙太奇语汇,这是影视剧本的要求,也是编剧海飞带给小说的东西。其实现实性和故事性兼具的小说传统,素来都能安排好富有密度的镜头语言式的核心场景、核心情节,换言之,现实性和故事性兼具的小说家何尝不是一位在自己颅内成像的导演和摄影师。《醒来》有几幕戏就是典型的,比如上文所说的那回苏门落下高跟鞋的情节段落,再比如上海赛马场那场谄媚的“中日友谊赛”中苏门的遇袭与沈克希、陈开来的初次接头,两条线索平行又交叉,有静有动,镜头感十足。当然,海飞如此直白(创意)地在小说开头、结尾的两章前后呼应,用了影视剧本的格式,中间的所有章节则都是规矩的小说体例,这仿佛在炫耀他借助影像叙事(形式)来打破小说常规的游戏心。

《醒来》在海飞的谍战叙事、谍战世界中保持了不错的水准。读之如见那些80年前的青年同志们,在江南的飞雪中似英气勃勃的林中标,如怀抱春意的冬末萌芽,昭示着历史的不易与不屈。